



□ 王学典

2021年5月9日，是《文史哲》编辑部全体工作人员最为激动、最为幸福的时刻，因为这一天我们接到了期盼已久的习近平总书记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的重要回信。我们将永远铭记这一历史性时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是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包括期刊建设的一个具体而集中的体现，也是对全体期刊人的一个巨大鼓舞与激励。习近平总书

记的重要回信，是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包括期刊建设的一个具体而集中的体现，也是对全体期刊人的一个巨大鼓舞与激励。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未来发展指明了航向。习近平总书

记的重要回信，是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包括期刊建设的一个具体而集中的体现，也是对全体期刊人的一个巨大鼓舞与激励。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未来发展指明了航向。习近平总书

就是新中国成立70余年来我国人文学术发展的一个缩影。

奠定《文史哲》的地位和声誉最重要的因素，是在推动70年来第一次共和国人文学术大转型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创刊伊始，《文史哲》杂志即扮演了一个人文学术引领者的角色。这一点是通过发起一系列重要学术论战实现的。这些重要论战无不涉及当时意识形态的重塑，引发学界的广泛瞩目。《文史哲》杂志用马克思主义，特别是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毛泽东思想来指导学术研究和学术转型。

1978年，进入改革开放共和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后，人文学术又开始第二次转型，就是与国际学术接轨，主动融入世界潮流。《文史哲》杂志在这次转型中的表现与第一次转型中不同，它没有位于最核心、最前沿的地位，而主要是从侧翼切入。

中国的现代化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处理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这就要求对传统文化进行理性审视和研究。就此而言，《文史哲》杂志可谓开风气之先，堪称研究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先行者。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文史哲》就率先开展传统文化研究。其中影响最大者，是以1962年在济南召开首次全国性的孔子讨论会为契机，前后刊发的20余篇关于孔子研究的文章，代表了这一时期客观研究和评价儒家思想的学术高峰。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史哲》察觉到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时代脉动，顺应和引导了重新评估传统文化的潮流。1984年组织的“文化史研究笔谈”，是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的发端。此后，《文史哲》相继开设“中国传统文化讨论”“国学新论”专栏，组织发起“儒学是否宗教”笔谈。这些工作的落脚点，都是希望引领对中国文化的正面评价和深入研究。

进入21世纪以来，《文史哲》更是通过开设“重估儒学价值”“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对话”“贤能政治的可行性及其限度”等专题栏目，致力于对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继承、弘扬与创造性转化，而成为刊发中国古典学术研究、传统文化研究成果的重要园地和代表性期刊。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人文社会科学正在推进第三次转型。在第三次转型中，《文史哲》更自觉地走在了时代前列，主动承担起学术本土化的使命，致力于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专门设立“文明互鉴与中国道路”“中国社会形态问题”“中国话语体系重建”等专栏，刊发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具有创新性和标识性的研究成果。

近十年来，《文史哲》始终围绕着一个中心，即如何从学理上发现并阐述“真实的中国”，如何锻造尊重本土经验的理论模型，最终要回答的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

会的历史特质和中国文化的未来走向。

《文史哲》杂志倡导学术本土化、中国化，但绝不复古守旧。我们既不能照搬西方，也同样不能照搬传统。我们对本土化的追求是在全球化、国际视野下进行的。2006年起，《文史哲》开设了“海外中国学”专栏，2011年，又开设了“世界文明对话”栏目。2014年起，《文史哲》杂志与荷兰博睿学术出版社合作，在海外发行《文史哲》英文版，旨在借助《文史哲》杂志的品牌和积累，以专题的形式，向海外学界介绍新世纪以来中国人文学术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目前，《文史哲》英文版已出版10期。《文史哲》英文版先后为两家海外索引数据库收录，在海外学界的关注度、认可度和影响力日益提升。《文史哲》英文版正在成为连接沟通中外学术的一个平台、一座桥梁。

《文史哲》的70年是与共和国风雨同舟的70年。这70年是《文史哲》杂志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是《文史哲》杂志发展史上新的历史起点，我们将在这个起点上再出发，开启更加美好的未来。今后，我们将以总书记重要回信为根本遵循，坚定不移地奋力前行，不辜负历史，不辜负新时代，不辜负总书记和党中央的殷殷嘱托，在共和国人文学术的第三次转型中再立新功！

（作者系山东大学教授、《文史哲》杂志主编）

## 汉代第一循吏文翁

□ 尹传政

中国的传统文化决定了自古以来就极为重视官吏的品行，因此在古代形成了政德文化。事实上，政德文化为历代史学家们所推崇，成为史作的重要部分。而这部分为史书所记载的官品较佳的官员通常称为循吏。所谓“循吏”，按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解释，是“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大概是指善于治理政事的清官。对此，《史记》专设有“循吏列传”，将孙叔敖、子产、公仪休、石奢、李离等列入其中。从此以后，凡修史志的，列传中都有循吏一章。因而，东汉班固在《汉书·循吏传》将王成、黄霸、朱邑、龚遂等西汉著名循吏列入其中。

而其中文翁被列为《汉书·循吏传》的首位。文翁，名党，字仲翁，安徽舒城人，由于通晓《春秋》，以庐江郡县吏的身份被提拔，汉景帝末年，担任蜀郡郡守。之所以文翁被列为首位，这与其在汉景帝末年为蜀郡郡守时期的政绩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他兴办官学教育、延揽贤能、大兴水利。

文翁的政绩要首推兴办官学，培养人才。他兴办教育，实行民风教化，则首先从官员的教育培养开始。据《汉书·文翁传》记载，他“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文翁欲诱进之”，于是“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访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这个记载是说，文翁选拔那些有才能的郡县小吏张叔等10多人，亲自对他们进行教育勉励，然后又将他们派送到京城，让他们跟随京城掌管书籍文典、通晓史事的博士进行学习，或者让他们学习律令。为了让这些蜀生能够受到好的教育，“减省少府用度，买刀布蜀物，赏计吏以遗博士”。文翁还减少郡府的各种开支，购买了蜀地的刀、布等物品，由计吏带着去送给博士，以表示感谢。经过几年学习之后，这些被送到京城的蜀生们，“皆成就还归，文翁以为右职，用次察举，官有至郡守刺史者”。显然，文翁都对他们进行了重用。

文翁对教育的重视不仅表现在对这些官吏的培育和选拔上，更多则表现在修建学校招收本地青年弟子进行教育、教化。事实上，文翁为了做好地方教育工作，还采取了很多措施进行办学。一是“为除更徭，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这是说，文翁为了鼓励年轻人接受教育，为受教育者免除徭役，对于那些成绩优异的就提拔为郡县官吏，次等那些接受教育的青年则赋予担任教民务农乡官的职责。二是公开宣传和推崇教育，培育崇尚学习的社会风气。“常选学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县，益从学官诸生明经访行者与俱，使传教令，出入闾阎。”意思是，文翁经常选拔那些官学学僮，让他们在非正式场合任职。每次出巡各地方时，就从学校中选拔那些通晓经术而且行为端正的人，使他们宣传教令，出入内府。显然，文翁这些重视教育的举措，大大激励当地人们的求学愿望，“县邑吏民见而荣之，数年，争欲为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以求之”。大意是，由于文翁重视教育，而且使受教育者有着无限的光荣，川蜀地区的民众都争着入学。

文翁还重视办学质量。首先文翁建立了专门学校，“始文翁立文学精舍讲堂作石室。一作玉室，在城南”。文翁的学校叫“文学精舍讲堂”，是用材质比较好的石头建造的，因而又被称为“文翁石室”。另一方面，在教育方式上，“水客”也自有一套方法。学生不仅要“攻读经典”，而且也要进行“社会实践”。文翁处理政务，常是学生坐在旁边听政，巡查各县时，也会带上一些学生，“从学官诸生明经访行者与俱，使传教令”，以教化百姓。这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培养模式，使得学生能够习得学以致用的知识，为以后当好官员打下基础。

同时文翁重视教育的举措，大大改变了川蜀地区的社会民风，使其得以教化。《汉书·文翁传》就提到，“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同样常璩的《华阳国志·蜀志》也评论道：“蜀学比于齐鲁。”意思是说，蜀地前往京师求学深造的学子数量，与孔孟家乡的学子数量相当，说明蜀地的教育水平已经到了一个较高的程度。而正是这种对教育的推动，造就了一个又一个川蜀之地的人才，宋代知府田况曾在《进士题名记》中指出，“蜀有西汉教化流而文雅盛，相如追肩屈宋，扬雄参鸾孟荀，其辞其道，皆为天下之所宗式。故学者相继谓之与齐鲁同俗，……至庆历六年，一榜得十

八人，皇祐元年得二十四人……”宋代之后，蜀地进士一榜也能中18人、24人，这都是源于文翁教化的结果。正如班固在《汉书》中所讲的那样：“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因此，文翁兴办教育的方式被纷纷仿效。汉武帝就要求中央政府推广文翁的“官学”的经验，在全国郡都设立官学。《华阳国志·蜀志》就记载“巴、汉亦立文学”，也效仿文翁石室办起官学。隋唐颜师古在《文翁传》中也表达了同样看法：“文翁学堂，于今犹在益州城内。”

文翁为官四川地区的另一重大举措，就是大兴水利，发展蜀地农业经济，奠定了四川地区的经济基础。文翁在刚刚上任之时，看到有很多灾民在成都街头流落，这是因为四川地区的繁县遭受了旱灾，大片耕地陷入严重的干旱而土地龟裂，而与之相反的是岷山县则遭受了严重洪涝灾害，被淹没，导致两个县的农业绝产，大量百姓为了生活而逃荒要饭。于是，文翁召集州官议事，提出了一个治理水旱的方案就是打通皂角岩，以此让上游的水下泄，既解决上游洪涝灾害，又使下游旱情得以解决。因此，为了治水，文翁一方面上书朝廷，要求下拨资金进行水患治理，另一方面还争取地方富绅资金支持。事实上，在修理水利过程中，文翁还下令严防偷工减料，保证工程质量，“治水钱款有限，若官吏有贪贿之举，就地立斩不赦”。经过一段时间治理，文翁治水初见成效。《华阳国志》曾这样记载：“孝文帝（按：应为景帝）末年，以庐江文翁为蜀守，穿湔江口，溉灌郫、繁田千七百顷。是时世平道治，民物阜康。”由此可知，文翁在继承都江堰水利体系的基础上，以渠首工程的湔江口为关键部位，在今彭州市关口地方，采用无坝引水的树谱状水利渠系，疏浚了山内的9条河流，使之顺畅汇入岷江；在关口下游，开通9条河，把岷江之水分流到下游各州县；并在平坝建立了自流灌溉水系，涝灾旱情因此得以控制。经过治理，郫、繁二县等岷江流域地方大片土地变成了旱涝保收的良田。特别要指出的是，文翁的这种无坝引水的渠系既没有改变江河及其水流的自然形态、状态和水质，没有造成生态破坏，又在最大区域范围内实现了农田的改良，并加以优化了农业生态，奠定了天府之国的农业物质基础。文翁治水，是继李冰之后四川地区又一次大规模的水利治理，从实际治理的效果上看进一步拓宽了蜀中水利工程体系以至拓展到岷江流域，使其有着更加广泛的水利灌溉面积和对洪水的控制能力。这在农耕时代的华夏而言可谓功绩显赫。



## “侨批”：信汇合一 纸短情长

□ 陈 十

侨批，又称“番批”，是海外侨胞通过海内外民间机构及后来的金融邮政机构寄回国内，连带家书或简单附言的汇款和领取包裹的凭证，是一种信、汇合一的载体（潮州方言中将“信”称之为“批”）。每份侨批背后的故事也许琐碎平淡，却忠实地记录了潮汕先辈漂洋过海，在异域他乡艰难创业的艰苦历程，千万份侨批汇入历史长河里，体现出的是潮汕先民身处异域却时时热爱祖国、情系故里的悠长浓烈的家国情思。国学大师饶宗颐对侨批这个文化现象给予“海邦刺藿、侨史敦煌”的极高评价。

爱国不仅是潮汕先民的高贵品质，更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核所在，在漫长的历史中不断积淀和壮大，已经深刻地融入进中华民族的血脉中。在国家 and 民族的危亡时刻，海外侨胞心系祖国，爱国主义精神得到集中体现。

“凡属中国之人民，自应俱（具）百屈不挠之精神，以为政府之后盾，本无规避之可言。为父母者，勉其子，为妇者，劝其夫，从军杀敌，以卫社稷；男儿以身许国，战死沙场（场），则英雄有用武之地。妇女保存贞节而牺牲，万古留（流）芳于竹帛。若人人如是，亦何惧凶暴之倭奴。若个个有坚决之苦心，吾相信中国复兴有日矣。以其忍辱苟存，何如（不）作壮烈之牺牲？恨吾寄身海外，未能立克（刻）回国，效力沙场，坐看大好河山。未碎于倭奴之手，此所以深引为憾者也。”

华侨李璇旺目睹祖国被侵华日军蹂躏却孤悬海外不能回国效力而心急如焚。其愤怒、焦急、后悔之

情在这一封普普通通的字数不多的侨批中被展现得淋漓尽致。他在侨批中大声疾呼，呼吁家人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图存的运动。在祖国危难之际，像李璇旺这些千千万万的普通华侨心系祖国，众志成城。有的华侨毅然舍弃海外优越的生活，回国抗战直至牺牲生命。众多华侨为抗战捐款捐物。有一件经过岁月沉淀而纸面发黄的侨批这样忠实地记载了当年海外华侨报效祖国的拳拳赤子之情：“在此国家千钧一发，最贵要的自然经济问题。战争军备，不外于此矣。人力心力，在于人民支持。然而我们既是国家的一份子，也须当努力，使解燃眉（之急）而得到胜利。”

“批一封，银二元，叫妻刻苦勿愁烦。仔儿着支持，教伊勿赌钱。田园着缴种，猪仔哩着饲。待到封有猛猛归家团圆……”这是一封收藏在广东省档案局（馆）的普通侨批。类似这样千千万万的侨批大都平凡又琐碎。但有批就有款，身处异域的海外华侨即使自身历经千难万苦，也要将辛苦赚来的微不足道的血汗钱通过侨批邮寄回家。他们在汇款的同时极其重视家风的建设。从这些琐碎的侨批中不难发现字里行间的家风建设内涵丰富厚重，影响深远。他是千千万万个华侨家庭的精神内核，这些与长期的家庭道德培养形成的良好家风是华侨精神追求与价值取向的集中体现。华侨社会中极其重视孝道家风成为华侨家庭重要的道德规范，孝老爱幼在潮汕尤其是华侨家庭的传统家风中占据重要地位。

1882年1月10日，广东省嘉应州（今梅县）华侨叶和仁写给母亲

钟氏的侨批虽历经百年，现在读来，依旧令人动容：

母亲大人膝下：

本月初接得阿坤兄带来书一封，捧读之下。诸事慨（概）悉。但读至亲病复发，儿不襟（禁）心动，自念不孝之罪重矣。及至调治略愈，方得稍宽。现儿既远出在外，徒劳尤益，万望吾亲宽心自解，勿以儿念念在心也，家中诸事当用则用，切勿吝惜。儿现年既长，自当谨守慈命，断不放肆，幸勿挂心怀。现今初到地方，诸事未悉，不能多串（赚）钱财。看明年光景如何，方能多寄银钱。……

兹今寄来洋银二大元，以为母亲买肉之资（资）。外又寄来银一大元，交吾妻陈氏收用。情长纸短，寸墨难宣（宣），笔言不尽，谨此奉禀。

叶和仁漂泊南洋，生活艰难，得知母亲旧病复发，“儿不襟（禁）心动，自念不孝之罪重矣”。发自内心的诚恳诚恐，然而却别无他法，只有托人奉上洋银二大元，以为母亲买肉之资（资），来弥补不能在生病母亲身边端茶倒水的愧疚之情。

旅居海外的侨胞，身处异域不仅牵挂父母，也时时关心惦记着家里的子女，把子女教育成才作为人生中的大事来抓。1948年元月20日，揭阳籍泰国侨胞郑钦桂在写给妻子王清莲的侨批中特地强调：“及儿女须宜教养。”1934年2月18日，马来西亚华侨冯云根在寄给妻子的侨批中这样写道：“远元男须勤功读书，切不可学恶习赌博一切，

至嘱至嘱。”连续两个“至嘱”可见其对孩子教育的用心和牵挂。

像这样的侨批比比皆是，虽是民间侨胞家庭间的情感交流，看起来琐琐碎碎，家长里短。但这些短短的侨批后面却是活生生的生动故事和历史印迹，生动地展现出海外侨胞内心的情感悸动。

侨批既是独特的文化现象，“有批就有款”的特点更是经济现象。在侨批的历史上，“水客”和“批脚”都是重要的华侨商人，该群体在当时的跨境贸易、资金往来中，起到重要的贸易桥梁作用。无论是“水客”还是“批脚”，都坚守诚实守信的原则。百年来，几乎没有听说有侵吞华侨款项资金的传闻。澄海隆都的许坤彬是当时较为有名的“批脚”，从1940年开始到批局停业为止，他走过的人家不计其数，送过的侨批更是难以计算，但无论多么艰难，许坤彬总是能准确送达。

侨批作为侨乡的集体文化记忆，是海内外情感双向交流的桥梁，具有巨大的历史文化遗产价值。侨乡显著的多元文化也正是在这种朴实无华的感情交流中得到空间的延伸，其特有的“信汇合一”的载体特点也促进了中华文明在海外传播发扬光大以及海外文化在侨乡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融合发展，蕴含着华侨爱国爱乡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倡导的价值追求。

